

改革

振兴

图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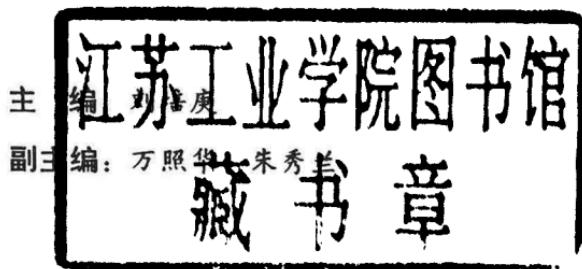
跨越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文集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丹东市中共党史学会

改革 振兴 图强 跨越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文集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丹东市中共党史学会

1998. 10

封面设计 朱希斌
责任编辑 朱秀兰
责任校对 竹菁

改革 振兴 图强 跨越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文集

出版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丹东市中共党史学会
印刷 中共丹东市委机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25
印数 1—300
准印证 辽丹内出字〔1998〕第 080 号

工本费 25.00

序

丹东市中共党史学会顾问 刘仲文

1978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由我国思想理论界展开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犹如于无声处的惊雷，震响在神州大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冲破了思想僵化、万马齐喑的思想牢笼，为重新确定党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时至今日，历史已然向世人昭示那场讨论确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也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2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它带给我们的却是举世瞩目的辉煌。作为这场社会改革的亲历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我们更能由衷地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诚然，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新老观念的转化必然会产生交锋；新旧体制的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新老道路的更替必然要作出抉择。值得中国人民庆幸的是，我们有邓小平这样卓越的领导人，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既

是历史作出的选择，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社会，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是要对改革开放中所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探索、总结和研究解决问题的种种办法。基于此，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丹东市中共党史学会的理论工作者立足丹东，放眼全国，展望未来，循着改革开放 20 年的发展轨迹，或回眸历史，或探讨理论，或总结经验，或献计献策，或调查研究，作为对历史、现时和未来的思考和探索，集思广议，畅所欲言，形成了这本文集。它试图从多方位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邓小平理论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观点；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改革开放是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以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等。尽管它在思想深度和涉猎的广度上还显不足，但它确是撰稿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考现实，研究问题的思想结晶，也是奉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的一份薄礼。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处在世纪之交，中国正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用邓小平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时代还要求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实际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他们这本文集的出版，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尽早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精神文明成果，使我们清醒地把握住世界发展的大局，清醒地认识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丹东

目 录

序 刘仲文

历史回眸

土改运动后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之比较 ... 高文恒 (2)

历史的选择 伟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比较兼论陈云对两会的贡献

..... 朱秀兰 (13)

党的两次工作重心转移比较 房月生 (23)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的地位和作用 曲延志 (31)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邓小平理论 刘慧瑛 (4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三次

思想解放 董光伟 (48)

企业制度重建的回顾与思考

——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之际 刘宁伟 (54)

我县二十年来水利工作的回顾和二十一世纪工作

思路的探讨 艾广厚 (61)

理论探讨

邓小平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王春友 (68)

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的里程碑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田锡文 (76)

略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智慧	顾伟	(88)
略谈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明小京	(95)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初探	于成玉	(99)
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陶元堂	(113)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和重大意义	邵启明	(117)
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建设	于军	(126)
破除空想，研究国情，把改革引向深入	关景维	(140)
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集中制的一致性	王夫之	(145)
邓小平的重视农业思想	张燕	(157)

改革良策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尹晓辉	(163)
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姜福孝	(168)
倡导俭朴作风是养廉的根本途径		
——浅谈预防和消除司法腐败的基本思路	张策	(172)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加强金融反腐败斗争	潘汝良	(177)
实现宽甸经济发展新突破的信心与策略	程远和	(181)

经验总结

丹东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主要经验	宋光 万政先	(187)
邓小平理论在地方税务中的实践	杜学东 李忱	(193)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全面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中共宽甸满族自治县组织部	(198)
小企业改革刍议	吕敏	(204)

努力创办特色医院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

——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成果应用初探

..... 太平湾发电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11)

调 查 报 告

大梨树村改革开放二十年经验浅谈 康爱琴 (217)

栗子树下话沧桑

——来自栗乡宽甸县的调查报告 孙鸿辉 (223)

三中全会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山村

——红旗镇 20 年来的发展情况调查 于 杰 (228)

林家村的变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凤城市青城子镇林家村发展变化的调查报告

..... 刘海娟 (231)

一 家 之 言

论严打斗争的法制定位 王 珞 (236)

党史人物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

——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发表 20 周年而作

..... 赵万兴 (243)

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两手抓” 白 丹 (248)

如何引导职工正确认识企业的减员增效

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孔祥君 (254)

历史回眸

土改运动后和三中全会以来 党的富民政策之比较

高文恒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都及时制定并贯彻了一系列富民政策。比较起来，虽然这两个时期党的富民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不同，且具体内容、提法又有差异，但二者又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都产生了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将二者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无疑会提高我们贯彻执行党的现行富民政策的自觉性。

一、两个时期富民政策的出台均具有客观必然性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土改运动后党的富民政策出台时的客观情况。

从1948年初以后，通过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陆续结束。经过土改，虽然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发展农村生产力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广大翻身农民仍面临诸多实际困难，群众思想还有不少疑虑和问题。以原安东、孤山两县（分别辖今东港市东、西部地区）为例，在1948年一、二月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时就面临这样三个严重问题：第一，除一部分中农外，许多贫雇农以及被斗被分的地主、富农尚缺种子、肥料、农具等必备的生产条件。同时，由于大规模参军参战，人力畜力普遍不足。如安东县当时的总耕地面积是412704亩，而男整劳动力仅为30511名，能耕地的

骡、马、牛、驴等牲畜只有 15294 头，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 13.52 亩耕地，每头牲畜负担 26.98 亩耕地；第二，由于在国民党占领期间蒋匪到处抓丁要夫，修筑工事，耗费民力，耽误了春耕播种，加之遭受严重水灾，造成 1947 年的普遍欠收（平均只有 4 成收成）。又因土改中一些地方吃大锅饭浪费了不少粮食，致使两县面临严重的粮荒威胁。一些村、屯至 1948 年 1 月就吃光了粮食，只能靠糠、菜、树皮、荞麦花等度日，讨饭、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据当时对孤山县九个区的调查，粮荒严重的户约占总户数的 41%；第三，由于土改运动中大轰大斗，平分土地和财产，以及一度存在侵犯中农利益等左的倾向，使两县农民较普遍存在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均产思想，许多人都对私有权发生了怀疑，误认为富有是罪，越穷越好，共产党喜穷不喜富，往后就得有活儿大家干，有饭大家吃。有人还说：“穷人是一家，不分你和我”，“人家冒烟我也冒烟”，“反正共产党不会让人饿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想生财之道，不打算把地种好，怕富裕后再被分被斗，个别的甚至光种地两头，中间不下种。

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在反复强调必须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同时，还于 1948 年 1 月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此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总政策。

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东北局、安东省，直至县、区党委、政府，都把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作为土改后解放区的建设工作和群众运动最中心、最基本的环节来抓，并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制定和宣传党的富民政策，以此调动群众发展生产、同灾荒和其他困难作斗争的积极性。安东、孤山两县从同年 1 月下旬开始，就通过下发文件和组织机关干部深入村、闾抓点带

面等方法，广泛宣传谁种谁收、不分不斗等党的私有权政策，并逐户帮助群众订立以生产节约为内容的发家计划。进入3月以后，两县抓住春耕前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发动力度，并进一步完善了富民政策的具体内容。孤山县于同月25日召开了由一千多人参加的历时9天的生产发家动员大会，县委书记邹问轩同志在会上公开宣布：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不能种地的，可将土地租出分粮，自己则从事编筐篓、纺花、织布等生产，这不算地主；贫雇农自己的地种上了，劳动力有余，可以卖短工，别人也可以卖零工；中农可以出租牛犋……会议期间，县政府还为部分劳动模范颁发了牲畜、农具等厚重奖品，以示鼓励生产发家的决心。安东县也于同月中旬召开了由946人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在公开申明党的富民政策，并让生产发家典型介绍经验的基础上，号召全县人民要做到人人劳动，家家生产，外无荒地，内无闲人，组织起来，发家致富。县长于镜清还在讲话中表示：“共产党喜欢穷人翻身，更喜欢翻身后都发财致富”，“大家越发财越好”。两县这种生产致富的政策教育，一直贯穿于1948年至1949年大生产运动始终，反复进行，并且后来又有“允许冒尖”等鼓励农民致富的新提法。

其次，关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出台并逐步完善的情况。

从1949年建国后至1956年，我国胜利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生活日益改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潮否定了党的强国富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在所有制结构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就连必要的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而痛加批判。在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大锅饭”取代了按劳分配原则，否则，便被扣上“金钱挂帅”、“物资刺激”、“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

“穷革命”、“穷过渡”、“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等口号一度也成为时髦语言。那时，许多人谈富色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限制和压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国民经济停滞不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当时由于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大”的错误还未被纠正，一些左的政策仍在继续，广大群众在生产致富问题上仍心有余悸。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大”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战略决策，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此，党的富民政策又重新出台，并逐步走向完善。

在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篇实际上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郑重阐述了党在新时期的富民政策：“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反复强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仅从1982年9月至1986年12月就讲了10次之多（经查阅《邓小平文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观点，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均对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

为鼓励农民致富，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经济政策。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

调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1981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从1983年至1987年，中共中央为深化农村改革，连续发出五个1号文件，规定农村改革要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1984年，党和政府还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1993年，党中央又规定原定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开垦荒地、营造林地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申明：“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提倡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三中全会后党的富民政策的重要内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个体经济以充分的肯定，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又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还充分论述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使私营经济成为合法的经济组织。同年，国务院还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文件，用以规范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后来，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又都重申了党的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五大还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将土改后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出台的情况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两个时期富民政策出台前，均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影响，广大群众生产致富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甚至产生一种惧怕致富的反常心理。这样，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社会经济状况也因此而不佳。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我们党制定和实施符合当时情况的一套富民政策，就势在必行，是客观必然的选择。只不过三中全会以来的富民政策较土改后比，显得更具体、更系统、更完善。

二、两个时期的富民政策均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其提高了生活水平

土改运动后，经过广泛深入的富民政策教育，广大农民群众逐步打消了均产思想，生产致富的积极性日益提高。主要表现：第一，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开展生产自救。据当时统计，1948年，安东省投入副业生产的共有10余万人，5000余辆大车。孤山县除男劳动力外，77%有劳动能力的妇女也参加了副业生产。全县共有编席小组382个，从业人员3052人，编席220766张；纺线小组152人，从业人员1035人，纺线40170斤；纳鞋底小组617个，从业人员7205人（产品未计）。此外，全县还编草帽158317顶，织布34125匹，其他诸如砍柴、烧炭、织网、织草包、放蚕、制绸等若干。安东县因苇塘和水田较多，除其他项目的副业生产外，苇、草织品生产发展异常迅猛。至同年11月份，全县的草包机已由原来的1800台增加到2603台，一个月就生产草包180万个。上述副业产品主要用于兑换粮食和豆饼（政府贷粮或到外地换粮），两县各达数百万斤，从而缓解和减轻了粮荒对群众生命的威胁。安东县到同年8月，灾民就由原来的8万人减至6千人左右；第二，积极从事运销业。例如，1948年7月，安东、孤山两县农民车拉肩挑，仅运销省政府下拨的贷盐就达110万斤，用以换取粮食和豆饼。同月30日，安东县一次就有94辆满载食盐的大车赴通化

地区换豆饼。该县自同年设立了集市后，广大农民从事运销和贸易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第三，下气力搞好粮食生产。1948年，心里有了党的富民政策底数的广大农民在种子、肥料、农具、牲畜、劳动力不足和粮荒严重的困难条件下，战胜了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终于夺得了土改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安东、孤山两县农民不仅按时播种了原有的110万亩耕地，而且还在“新开荒地免征公粮”的政策感召下，当年开垦荒地17031亩，对旱田还基本做到了两铲三趟。许多农户收获的粮食够吃二年以上，最多的可吃四、五年。通过大生产改变了经济地位的农民群众于当年秋收后纷纷购置车马农具，次年，又获得了粮食的较好收成。

同样，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逐步完善，农民的思想越来越解放，生产致富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以东港市为例，粮食亩产由1978年的303公斤增加到1997年的383公斤，上升了80公斤，总产量达到409494吨；二是多种经营发展迅猛。从东港市以下几个数字便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家禽出栏数由1978年的57.3万只增加到1997年的247.7万只，增长332%。海产品总产量由1978年的19355吨增加到1997年的125442吨，增长548%。甜(西)瓜种植面积由1978年的537亩增加到1997年的4755亩，增长785%。其他诸如牛、羊、生猪、淡水养殖、水果、板栗、花生等多种经营也无大幅度增长；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就高达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东港市乡镇企业也于三中全会后有了长足发展。1997年与1978年相比，企业总数由226家发展到18738家。产值由1339万元上升到826234万元，增长了600余倍，是农业总产值的5.4倍；四是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1978年，东港市仅有个体工商业户178户，从业人员

196人。三中全会以后，全市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工业、商业、餐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门类齐全的六大经济体系。到1997年，全市个体工商业户已发展到26024户，从业人员43752人，创产值495633万元，利税63270万元，私营企业发展到830户，从业人员8216人，创产值89371万元，利税11326万元。在全市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中，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占80%以上。应当说，这些个体私营企业主是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并率先走向富裕的农民典型。

农村生产的大发展，相应地带来了农民生活的大幅度提高。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已经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6年的1926元，增长了14.4倍。全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也已经从1978年的25000万人减少到1996年的58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067万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三中全会以来，东港市农民群众生活提高幅度更大。1997年，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高达2608元，比1978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121元增长了20.5倍。从储蓄存款情况看，1978年全市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4468万元，人均78元。1997年，全市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则上升到325444万元，人均4980元，是1978年的63倍。如今，手头愈来愈宽裕的农民，不仅居住条件明显改变，而且许多人还购置了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商品，甚至家庭拥用摩托车、拖拉机、电话、汽车等也不算稀奇。

上述有关土改运动后和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变化情况的数字说明，党的富民政策能够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生产致富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而使其生产得到不断改善。

三、两个时期的富民政策均促进了社会文明与进步

党的富民政策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水平的提高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明与进步，这是将两个时期相比较后得出的又一结论。